

【学术论文】

晚清南洋海军购造舰船述论

陈先松 焦海燕

摘 要: 南洋海军是清政府海防建设的重点地区,自光绪元年筹建。但在随后的20年中,南洋海军发展缓慢,且因实力弱小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龟缩长江一隅,坐视中国耻辱战败而丧失近代化的宝贵良机,个中原因,令人深省。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以历任南洋海防大臣的任职顺序为线索,勾勒他们海防思路的演变轨迹及其实际作为,阐述南洋海军发展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 晚清 南洋海军 购造舰船

洋务运动期间,南洋是清政府海防建设的重点地区,自光绪元年(1875年)起由两江总督兼任海防大臣,收用国家按年划拨的海防专款,并享有较多人事、筹款权力。但在随后的20年中,南洋海军发展缓慢。就海军发展最物质化的表现——舰船购造而言,学界虽有涉及,但篇幅简短,对历任南洋海防大臣购船态度及过程研究不足,在史实层面上也有一些出入^①。本文依据相关档案史料,以沈葆楨、刘坤一、左宗棠、曾国荃等南洋海防大臣的任职顺序为线索,勾勒他们海防思路的演变轨迹及其实际作为,阐述南洋海军发展的艰难历程,加深对晚清海防史、甲午中日战争史的理解和思考。

一 沈葆楨与南洋海军舰船的停购

沈葆楨为南洋第一任海防大臣,于光绪元年四月授命,十月正式上任,直至光绪五年十一月病逝^②。在其任期内,李鸿章尚执迷于蚊船固守海岸,沈葆楨已高度重视大洋海军建设,劝称:“铁甲船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若仅恃炮台、水雷、蚊子船等事,非不足以守口,倘彼攻其所不守,则迁地弗良,我积年所备者尽居于无用之地……海上事起不必开仗,即护运递信亦所必需,否则彼以一船封港而气脉尽窒矣。”^③此类言论于其函牍资料中不胜枚举。

沈葆楨谦让海防专款,是限制其海防作为的主要因素。光绪元年,清廷令江苏等省关按年解拨海防专款,每年号称“四百数十万两”^④,虽名不副实,却也是南北洋海防建设的主要经费来源。其间,李鸿章一再强调海防专款收数有限,难以购置铁甲船,沈葆楨同意让出南洋份额,统归北洋收用^⑤。沈葆楨之举固是大公无私,却对南洋海军的发展带来极大不便,身边官员多责其不当,沈本人亦发出“铁甲诚要图,无如款不在握”的感慨^⑥。至光绪四年,沈葆楨奏准收回南洋海防专款^⑦,然时机已晚,至光绪五年底,仅收银30余万两,“筹办海防,所有修筑炮台、购买枪炮各项,均出其中,悉索之余,诸形棘手……本省应办防务尚有悬而待款者”^⑧,难以购造舰船。另外,沈葆楨“浑

身是病,须鬓皓然……到任(指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笔者注)以来,一月必有旬余不能见客,拜跪需人扶掖,祭祀从不能到”,自感“洋务、饷务尤非力之所胜”,时思“谨避贤路”,亦不能不对海军建设产生负面影响^⑨。

二 刘坤一与开济巡洋快船的购造

刘坤一第一次任职南洋,是为第二任海防大臣,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从两广总督调补两江总督,至光绪六年六月正式上任,光绪七年十二月离职回籍^⑩。

早在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期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年),刘坤一任职江西巡抚,就探讨过海防建设,但他对近代海军的重要性认识不多,其海防折坦言:“至购买船炮,添设厂局,与夫各海口择地设防,应由该大臣、督抚斟酌办理。臣未身亲其事,且相距甚远,未敢妄赞一词”;后议复丁日昌海军计划,对购置大兵轮船虽表赞同,语意颇为牵强,文称:“其事似属可行。”^⑪

光绪六年,刘坤一担任南洋海防大臣,之前在广东等沿海省份历练数年,也算“身亲其事”,但对海军建设仍无热情。刘称南洋即使有铁甲船多只,亦不能与敌舰驰骋大洋,“以我所短,敌彼所长,殊难操必胜之术”。在刘的防务思想中,能操必胜之术、“以我所长敌彼所短”,仍在于岸上炮台及陆军,所谓“炮台为江海干城,参酌不厌精详”,并称广东、江苏、直隶等省紧要口岸“有险可凭”、“虽不敢谓确有把握,尚可以勉强支持”^⑫。除识见外,刘坤一精力颓废,政务上亦不愿有所作为,自评:“弟南洋承乏,碌碌无所短长,而于地方盐务、河务诸大端,亦属无力振顿,唯有守故蹈常,为苟且偷安之计而已。”^⑬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海军建设与之多次协商,于光绪七年感慨其人为:“至南北洋各立水师一军,以备游击声援,尤宜及早筹办……岷翁(指刘坤一——笔者注)迭奏不以铁甲为然,更不知快船、雷艇之必不可少,何从更索解人。渠即久于其任,恐亦无甚振作。”^⑭

刘坤一任期之内,添造开济快船,事属偶然。开济快船图纸,即法国民厂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所绘并于光绪三年为日意格所购得者。时任船政大臣吴赞诚曾因经费支绌,函商南洋协拨工料银10余万两,遭到拒绝^⑮。仿造事拖延下来。光绪六年二月,李鸿章奏准购置铁甲船2只,拟其中1只归福建省并由该省自筹购船经费,除此外,李鸿章还提及福州船政局可仿造快船,“与购之外洋者相等,而与铁甲船相辅并行,为用甚大”^⑯。铁甲船既归福建,福州将军穆图善等遂协商福州船政局,拟造巡海快船,据称每只约40万两,“开办伊始,必须预筹二十万两”,时船政局经费“积欠甚巨”而福建省筹措铁甲船经费后“空拳赤手,无以为匠作先”,便借口“不能不借助邻封”,奏准由南洋协拨20万两,“以为经始之费”^⑰。

开济快船,系由福建省官员奏请建造,与刘坤一没有关联,后因福建省无人主持而闽省铁甲船又成泡影,才调归南洋海军。该船身长约261尺,宽35尺,吃水18尺,排水量2200吨,马力2400匹,速率15节^⑱。在制造此船的过程中,南洋由江南筹防局拨4万两,另从陕甘军饷及粤海关应解南洋海防专款内拨16万两,共20万两^⑲。

三 左宗棠与南琛等五只巡洋快船的购造

左宗棠是南洋第三任海防大臣,于光绪七年九月授为两江总督,十二月正式上任,至光绪十年正月因病补缺,同年三月正式离职^⑳。

任职南洋之前,左宗棠对海军建设的态度较为消极。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时,左宗棠督军西北,

见闻有限,且涉及到海防、塞防争饷,反对购造新式战船。左宗棠认为铁甲船“质重而坚,不能入口收泊”,其利只在冲撞,而将撞之时,巨浪汹涌,轮船亦易于趋避,若轮船停泊口岸,铁甲船不能驶入,“亦不畏其冲劈也”;大兵轮船不能收口,“炮多无所用之,舷高易招炮击,船笨则轮不能速,亦须防梗婆子(指蚊船,“gunboat”的音译——笔者注)轮船之最小者”^{②①}。至于李鸿章、丁日昌倡购铁甲船、大兵轮船,左宗棠认为是受《申报》等新闻纸所惑,这些新闻纸皆由英国人出资操作,“报之海上奇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究其实,李鸿章、丁日昌等人“本无所闻见,乃竟侈口而谈”^{②②}。当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攻讦李鸿章、丁日昌等海军言论时,左宗棠赞其为:“力持正议,足使狂夫夺气,良为佩慰!”^{②③}至光绪六年,李鸿章筹购铁甲船并委托赫德订购新式快船,左宗棠致函好友杨昌浚称:“合肥(指李鸿章)现又奏办快船,以能战然后能守为言,诚不知其何意也。”^{②④}又致函总理衙门称:“铁甲本英国废弃不用之船,阅《西国近事汇编》英人所谈英事,尤为明晰,而当事方欲以重价求之,且议以海战为海防,袭历代覆辙,贻异日之悔,意独何居?”^{②⑤}所谓“能战然后能守”、“以海战为海防”,皆指购置铁甲船、新式巡洋快船以争战大洋而言。左宗棠对此仍持异议。

光绪七年,左宗棠入朝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月,奏请教练旗兵并兴修直隶水利^{②⑥}。公务上的联系,使左宗棠与李鸿章私人关系渐趋融洽。当李鸿章因洋务被参时,清廷以“肆口诬蔑罪言者”,左宗棠赞为“慈圣明决,善持大体如此”。左宗棠还致函刘坤一称:“李伯相(指李鸿章)晤谈数次,意见已融,无复从前偏执意态。”^{②⑦}李鸿章亦称左宗棠“盘桓两日,意见肯融,沿途咨访情形,似已略知梗概,不似从前之夸张”、“巡河过津小住,握手如平生欢,尚不失为君子。”^{②⑧}左、李二人关系的融洽及海军意见^{②⑨}的交流,利于左宗棠海防建设思路的转变。

同年,左宗棠任职南洋,临行进朝陛见,慈禧嘱以海防、盐务并重^{③①}。左宗棠承认“频年驰驱戎马,于海邦事宜未能洞悉,深虑以勿询之谋贻误军国”,并先后向江南提督李朝斌、江苏巡抚卫荣光、兵部尚书彭玉麟等咨询防务^{③②}。光绪八年七月,李鸿章回籍途经南京,左宗棠邀与晤商。其时,彭玉麟建议购造小轮船,以协防长江炮台并坚称“有海防无海战之说”,左宗棠一方面表示赞同,另一方面又部分采纳了李鸿章以战为守的思想,称:“若筹兼顾南洋,则遇有警报,各省向一洋面,自顾不遑,何能为两江之助?江南海口宜守,亦难应各省之援,其于兼顾之义,终鲜实济。自宜亟筹增制大轮船数只,以资调度而速戎机。”^{③③}此说表明左宗棠海防思想已朝大洋海军进了一步,事后他向彭玉麟解释:“日间正筹造船、购炮诸务,参以李相(指李鸿章——笔者注)成规,又谋之闽厂学生议论,觉有条续,拟遂欲吕庭芷商办大轮船五号。”^{③④}左宗棠的置船计划是:以福州船政局开济快船为准,每船约30万两,拟造5只,备外洋争战用;彭玉麟所倡议的小轮船,每只约8万两,拟造10只,备协防长江炮台用;所有造船经费可从两淮票税项下支付,“一年内外,轮船经费计可有余”,食盐若“销路渐畅,杂款亦可奏请酌拨,俾能接续解济要需”^{③⑤}。

此计划后略有改变。原拟添置的巡洋快船,内2只由福克向德厂订购。福克为德国商人,于光绪六年赴兰州兜揽军火、洋债。左宗棠始知其人,评价颇高:“德国来甘之人多朴实而近情理,福克尤敦谨可取。”“福克为人甚讲情理,无亢倨狡诈之习,弟与相处一月,颇能用之。”^{③⑥}光绪八年夏秋间,因闽厂制船能力有限,“未能速观厥成”,左宗棠商请福克购船。据福克称:若由德国船厂制造,8个月可成2只,每只工料约27万两,“所有炮价以及来华使费不在其内”。左宗棠认为需时较短,而工料亦较闽厂原估少数万两,遂订立合同:定造2只快船,“悉如闽厂所造之式”,若工料不如福州船政局,应退回定银,该商来往川资亦由其自己承担。左宗棠还派船政学生陈兆翱前往监造,以“期工坚料实,费不虚糜”^{③⑦}。此2船即南洋海军之南琛、南瑞号,身长280尺,宽36尺,吃水深

17尺,排水量1950吨,马力2800匹,速率13节³⁷。2船连船炮、驶华费用等共约70万两³⁸。

除向外洋订购2船外,南洋原应续造快船3只。然至光绪八年十一月,左宗棠将开济快船计数于内,遂委托福州船政局再造2只。其间,德国使臣李凤苞嫌开济快船太旧,建议改造济远式穹甲快船,左宗棠亦“以为然”,但福州船政局无力为之,新造者仍为开济快船的同型舰³⁹,具体参数相同。此新造2船即南洋海军之镜清号、寰泰号。南洋拨支该2船工料银66万两、鱼雷筒等银2.22万两、船炮等银15.33万两,共83.55万两⁴⁰。

长江小轮船身长17丈余,其船火力主要是头、梢两炮,再配以边炮辅之。按彭玉麟构想,若敌船冲入长江,以此小轮船四面环攻,跟踪追击,或诱致浅处,“彼已如陷泥潭,我则游泳自如,尤为胜着”。此类小轮船据称每只工料约7万余两⁴¹。此为光绪六年的约估。至光绪八年十一月,由江南制造局绘图重算,每船竟需17万余两,较原估多10万两,且“炮位在外”。左宗棠令先行试造1只,并强调“只期工坚料实,费不宜省”⁴²。江南制造总局随即改变小轮船的简单设计,“仿照外洋最新兵船之式”,加长3丈有余,并相应加宽加深,实为新造巡洋快船。此即南洋海军之保民号,身长225尺,宽36尺,吃水14尺余,马力1900匹,速率约11节⁴³。南洋拨支该船工料银21万两、船炮银5.3万两⁴⁴,共26.3万两。

除保民船外,由于经费原因,后任南洋大臣曾国荃终止了长江小轮船原造计划⁴⁵。

四 曾国荃与南洋海军舰船的停购

曾国荃为南洋第四任海防大臣,于光绪十年正月署理两江总督,三月赴任,七月补授,至光绪十六年十月病逝离职⁴⁶。曾国荃上任海防大臣,正值中法战争,对海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及南洋海军的衰弱有清醒认识,尝称:“停战者非忘战之谓也……至法祸起后而始见诸实事……船炮之孰利孰钝,既已粗得分际,圣人有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谓一经停战,遂高枕无忧,包干戈以虎皮,不特衮衮诸公义不出此,即荃之无似,固亦未肯甘心焉。”⁴⁷

按曾国荃设想,拟购置铁甲船2只、快船5只、鱼雷船10只,总费约720万两。时南洋经费支绌,曾国荃议及长江各省协款、借洋债办法。曾国荃认为长江上游诸省安危与南洋防务紧密相关,每年可由安徽省协12万两、江西省协24万两、湖北省协24万两、湖南省协20万两、四川省协20万两,以7年为期,共700万两,“专备购船之用”,各省协款到齐之前,可先借洋债240万两作为购船订价,“随时收到协款,随时付还借项”,息银及其余“养船之费及购备船内枪炮子药及一切费用”皆由南洋自付⁴⁸。此筹款计划上奏于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不等清廷回复,曾国荃即展开行动,一方面函知安徽等5省督抚,并于1个月内至少获得安徽省、湖北省积极响应;另一方面饬令江南筹防局与上海瑞生洋行洽谈借款、购船事宜,并邀得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厂主亲赴南京,“势难久延”⁴⁹。然而,当曾国荃六月再次上奏,强调“其经费取助于五省,而犹不能不借洋款者……良以五省之饷非分年限不能悉至,定购之船,一成交易,即付定银”时,慈禧朱批云:“至借洋款以购兵轮,究非长策,著另筹办法具奏。”⁵⁰南洋购船计划终不了了之⁵¹。

曾国荃与刘坤一不同,应该说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有深刻体会,尝谓“制备铁甲等船为目前海防第一要策”⁵²,然除光绪十一年有始无终的大动作外,此后亦无作为。这种反差与四方面因素有关:(1)经费有限。查江南筹防案清单,至光绪十五年底止,南洋经费除炮台建设、薪饷开支外,历年积存银75万余两,用于非海防建设项约39万两⁵³。也就是说,倘若曾国荃没有挪用海防经费,可以集款购置舰船的数额至多为110万余两。其时,南琛等非装甲巡洋快船已为旧式,若添置致远、经远(每只约80余万两)等新式巡洋快船,只敷购置1只。南洋经费远谈不上充裕。(2)曾国荃购船思

路。曾国荃反对零散购船,称:“议者或请分作数次购买,即可无须再借洋债,殊不知分购则势孤,势孤则仍未能有备无患,必取式新价廉全数定制,庶足收取精用宏之效。”^⑤以南洋经费历年存款购置1只新式快船,显属“势孤则仍未能有备无患”之列,曾国荃不屑为之。(3)清廷中枢掣肘。光绪十二年后,海防专款等统归海军衙门调度,与此相对应,清廷对南北洋海防建设的控制亦趋加强。曾国荃形容为:“(从前)外间举办海防,照新章无论一草一木,已须先期奏明立案,然犹曰款自外筹,尚可一面动办,一面具奏。今若事事请款而后办,太繁势将取厌,姑待又虑后时,设有缺误,岂能以此卸责。”^⑥在“太繁势将取厌”的情况下,曾国荃不愿费力多事。(4)曾国荃个人魄力。左宗棠在经费欠缺时,尚能购造5只巡洋快船,尝言:“此时分年为之,尚不甚吃力,(若非如此)恐以后更无人耽承此事。”^⑦若以此言衡量曾国荃,不能不责之尚少一分为国为民“耽承”重任的勇气和魄力。

五 刘坤一与辰字等四只鱼类艇的购造

刘坤一第二次任职南洋,是为第五任海防大臣,于光绪十六年十月授为两江总督,光绪十七年三月接印上任,至光绪二十年底止,职务并无变化^⑧。在此三四年间,刘坤一筹办防务仍秉持岸防优先、海战为后的思想,称:“中国海防在守而不在战,若与炮台联络,木壳兵轮亦可折冲御侮。倘与西人角逐重洋,即铁甲兵轮未必能操胜算,亦虑驾驭不得其人,转以资敌。添办一号,便须二百万金钱,此等糜费,不可不审顾踌躇。”^⑨实际上仍将海军建设置于次要地位。

然山东巡抚张曜对南洋海军的发难,却间接地促成了辰字等4只鱼雷艇的购置。光绪十七年四月,山东巡抚兼帮办海军衙门大臣张曜同北洋大臣李鸿章操阅南北洋海军。事竣,张曜认为英法等国的铁甲船装甲至14寸,北洋海军定远、镇远2船铁甲厚度大致相仿,济远、经远、来远3巡洋快船亦装甲近10寸,而南洋海军开济等6只巡洋快船铁皮厚度“既无一寸厚者,遇有战事,断难得力”,明知不堪海战而贻误于平时,不如将开济等6船“收停厂澳”,每年可节省维养费用50万两,积至10年,以500万两另造铁甲坚船,“则精良适用,足以震慑远人”。于奏折中,张曜还强调国家战事应精益求精,“未可任虚名,亏损实用,致启戎心”。奉朱批:“著海军衙门会同刘坤一妥议具奏。”^⑩刘坤一闻讯后,积极联络北洋大臣李鸿章,称“一律停撤,似非局面”,愿裁撤旧式轮船数只,以保全开济号等南洋海军精锐。九月初三日,李鸿章函商海军衙门,称刘坤一方案“自是酌中办法”^⑪。初十日,海军衙门主稿、掣刘坤一街上奏议复,陈列开济等6船不宜裁撤的理由:若将各船全部裁撤,防守无资,“易启外人轻视”;兵轮船可以弹压民乱、“巡缉护漕”;开济等船虽难比定远、镇远等舰船,与北洋超勇、扬威2船“似尚足以相埒”,虽不能与敌船“角逐海上”,但依附炮台,“亦未尝不可”;海军人才难得,南洋海军将弁训练多年,一旦裁撤,“势必尽隳前功”。同时,参考刘坤一的折中方案,议定:将龙骧等4只蚊船暂行裁撤,开济等船亦酌减人数,“以勉敷寻常巡操为度”,每年约节省薪粮等10余万两,“一概不准动支。积存数年,专备添购新式碰快、雷艇之用。仍俟筹有款项,即行购制铁甲等船”^⑫。查江南筹防案清单,自光绪十八年起,南洋每年约节省18万两^⑬,作为购船专款。对此购船计划,刘坤一于光绪十八年七月致函李鸿章,称南洋防务重在长江,无需铁甲船、装甲巡洋快船等“笨重之船”,若必须购置,可查照致远式置船2只加以数只鱼雷艇,如此,合原有兵船,“分布长江下游,与岸上炮台,水陆联络,似尚可以支持”^⑭。至光绪十九年六月,刘坤一担心购买快船,质量难以保证,且购船经费有限,遂先购置鱼雷艇4只,“将来如有不敷,续购亦易”^⑮。

为便于比较,此4只鱼雷艇分向德国伏尔铿厂、什好厂订购。其中,购于伏尔铿厂者即南洋海军之辰字、宿字号鱼雷艇,身长144尺,宽17尺,吃水7尺,排水量90吨,速率18节,购价连运保等费共55.04万马克,按时价折银约19.38万两;购于什好厂者即南洋海军之列字、张字号鱼雷艇,身长130

尺,宽15尺,吃水深7尺,排水量62吨,速率16节,购价等费共58.54万马克,折银约20.62万两^⑥。

南洋海军舰船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操江号、惠吉号、测海号、威靖号、海安号、驭远号、登瀛洲号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制造的木质轮船,及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等北洋赠送的旧式蚊船^⑦。这些舰船虽是无偿划拨,但成船年代较早,质量较差,战斗力低下,对海军战力无甚帮助。一是下表所列开济、南琛等新式舰船,作为南洋海军的主力,其技术较为先进,而制造成本较高,需由南洋大臣筹款购造。在此购造舰船以发展海军的必经过程中,历任南洋大臣在甲午战前的表现各异:沈葆楨、曾国荃任期共约12年,海防思想最为先进,海防态度亦相对较高,然因经费困难,并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终一无所成;刘坤一任期约6年,海防思想最为落后,海防态度最为消极,但在各种机缘巧合下,终完成开济船及辰字等4只鱼雷艇的购造,此非其个人所为,而是时势使然;而反观左宗棠,任期内2年余,海防思想较西征时有所提高,比李鸿章、沈葆楨等仍有不如,但其海防责任感的迫切、虚心求教的态度及勇于任事的魄力,令人叹服,在经费同样困难的情况下,力主购造南琛等5只巡洋快船,其留下的评语“此时分年为之,尚不甚吃力,(若非如此)恐以后更无人耽承此事”,尤值得今人思考。

附表:南洋舰船购造概况及其支费数额表

船名	类型	排水量(吨)	马力(匹)	速率(节)	主购(造)年分	主购(造)	南洋承担费用(银:库平两)
开济	巡洋快船	2200	2400	15	光绪六年	穆图善等	20万
南琛	巡洋快船	1950	2800	13	光绪八年	左宗棠	约70万
南瑞	巡洋快船	1950	2800	13	光绪八年	左宗棠	
镜清	巡洋快船	2200	2400	15	光绪八年	左宗棠	83.55万
寰泰	巡洋快船	2200	2400	15	光绪八年	左宗棠	
保民	巡洋快船	1900		11	光绪八年	左宗棠	26.3万
辰字	鱼雷艇	90		18	光绪十九年	刘坤一	19.38万
宿字	鱼雷艇	90		18			
列字	鱼雷艇	62		16	光绪十九年	刘坤一	20.62万
张字	鱼雷艇	62		16			
总数							239.85万

资料来源:1.本表格相关数据皆引自正文。2.开济船虽由福建省官员穆图善等议造,但终归于南洋海军。议造时间为光绪六年,事属刘坤一任期内。3.各船支费指南洋大臣所承担的数额。若究全船购造总价,开济船约银40万两,除南洋协款20万两外,其余银20万两由福州船政局从制造经费项下承担^⑧;保民船约银27.68万两,除南洋拨工料银、炮价银26.3万两外,江南制造局从制造经费项下凑拨银1.38万两^⑨。

注释:

①关于南洋海军购造舰船的成果有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7—98页;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225、381—385页;戚其章:《晚清海

- 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209页；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9—1021页；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9—102页等。除王家俭外，其余学者对左宗棠的海军贡献少有正面评价，认为其无所建树，甚至认为他只顾与李鸿章抗衡。《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等认为沈葆楨曾出款购买4只蚊船，樊百川等认为曾国荃只知安享禄位等，这些评语与史实稍有出入。
- ②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沈葆楨折，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0—5101—30；江苏巡抚吴元炳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2—5142—151。本文所引军机处录副奏折，除特别注明者外，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③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277页。
- ④光绪元年应拨350余万两，其余年份数额更低。参见陈先松：《海防经费原拨数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 ⑤⑦沈葆楨折，光绪四年二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2—38。
- ⑥沈葆楨折，光绪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34—6597—62；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第546页。
- ⑧吴元炳折，光绪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5—7。
- ⑨除沈葆楨自述外，时人信函资料中亦有佐证，例如：光绪二年十一月，李鸿章致函闽浙总督何璟称：“幼帅（指沈葆楨）闻又续假，颇怀退志”；光绪四年，左宗棠致函山东藩司陈士杰称：“幼丹（指沈葆楨）急思敛手，亦缘无可如何，闻其须发皤然，早衰有态，实难久膺繁剧”等。参见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第321、394、548、577、604、606、646、693、707、783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7页；《左宗棠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1986年等年版，第367页。
- ⑩《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册，第3页；第2册，第560、677页。
- ⑪刘坤一折，同治十三年，军机处录副奏折：3—84—4778—12；刘坤一片，同治十三年，军机处录副奏折：3—84—4778—13。
- ⑫刘坤一折，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5—14；刘坤一折，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5—40；刘坤一片，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5—15。
- ⑬⑭⑮⑯《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507页。
- 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76页。
- ⑱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第771页。
- ⑲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9、108页。
- ⑳穆图善等片，光绪六年四月初七日（奉旨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04—6。
- ㉑开济船相关参数同镜清、寰泰2船，具体参考池仲佑《海军实纪·造舰篇上》，其所载开济、镜清、寰泰3船数据皆是鲁班尺，本文按1鲁班尺约等于0.984英尺折算成英尺数据。见池仲佑：《海军实纪·造舰篇上》，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左宗棠等：《船政奏议汇编》，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72—17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4页。
- ㉒参见左宗棠单，光绪九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7—46；左宗棠片，光绪八年七月初十日奉旨日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124249；左宗棠等：《船政奏议汇编》，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72—175，第1089、2047、2111页。
- ㉓见《左宗棠全集》第8册，第466页；第15册，第638页；《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677页。
- ㉔总理衙门照录左宗棠信函，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1—9；总理衙门照录左宗棠信函，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1—11。
- ㉕参见《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514、562、571、576页。
- ㉖《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529页。
- ㉗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584页。
- ㉓《左宗棠全集》第15册，第638页。
- ㉔《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686、692页。
- ㉕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李鸿章致函四川总督丁宝桢称：“近屡晤谈（左宗棠），不但无鞭撻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志，外强中干，概可知已。”此番评语表明，左宗棠、李鸿章曾就海军建设交换过意见，但左宗棠似未示以明确态度，李鸿章颇为失望。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95页。
- ㉖《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740、742、752、753页。
- ㉗左宗棠折，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42—7。
- ㉘整顿两淮盐务而增收的票税，是左宗棠兴办海军的重要经费来源。参见左宗棠折，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42—7；陈先松：《甲午战前20年南洋海防经费收数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
- ㉙《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634、638页。
- ㉚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69页。
- ㉛《曾国荃全集》，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册，第184页。
- ㉜镜清、寰泰2船于光绪十一年先付船炮定价1/3，约规平银5.6万两，按此估算，船炮总价共16.8万两，按规平银1两折库平银

- 0.9124086两,约合库平银15.33万两。相关数据参见曾国荃单,光绪十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8—20;曾国荃单,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90—35;曾国荃单,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23—6104—69;曾国荃单,光绪十三年,军机处录副奏折,3—115—5853—76;曾国荃单,光绪十四年,军机处录副奏折:3—133—6563—49;曾国荃片,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旨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9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81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36页。
- ④①彭玉麟片,光绪六年九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85—35。
- ④②《左宗棠全集》第8册,第181页。
- ④③曾国荃片,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奉旨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09—7。
- ④④见刘坤一片,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奉朱批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11—17;曾国荃片,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09—7。
- ④⑤光绪十年十一月,曾国荃借口两淮盐票税早已用尽,停造长江小轮船。见《曾国荃全集》第4册,第244页。
- ④⑥见《左宗棠全集》第8册,第466页;曾国荃折,光绪十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3—5188—9;江苏巡抚刚毅折,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6—5270—48。
- ④⑦⑤⑤《曾国荃全集》第4册,第292、323、324页。
- ④⑧曾国荃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7—9165—16。
- ④⑨曾国荃片,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7—9165—18。
- ⑤④⑤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4辑,第838—840页。
- ⑤①曾国荃向长江各省函述购船计划时,表示:“计此折不日当可见旨。若中朝以国荃不足胜其事,或庙算别有良图,散疏报闻而已,则无所需此;如微天之幸,辱蒙圣明俯采,见诸施行,散处即须先举洋债以作定银,此款归还之费以及嗣后凑付之费,均于贵省是赖矣。”此函实是将购船计划置于立即施行或者放弃的境地。慈禧朱批显系“不予立即施行”,可能正因此,曾国荃没有就南洋购船事再做努力。见《曾国荃全集》第4册,第303—304页。
- ⑤②曾国荃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7—9165—16。
- ⑤③参见署两江总督沈秉成单,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23—6120—6。
- ⑤④《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679、680页。
- ⑤⑤张曜折,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96—24。
- ⑤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5册,第252页。
- ⑤⑦海军衙门大臣奕劻等折,光绪十七年九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396—46。
- ⑤⑧刘坤一单,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13000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⑤⑨《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2022页。
- ⑤⑩舰船参数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170—171页;购价参见《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790—791页。
- ⑥⑥光绪四年,李鸿章感于沈葆楨谦让海防专款而南洋防务紧急,表态愿赠送4只蚊船。参见林海权点编:《沈文肃公牍》,第484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327页。
- ⑥⑦参见左宗棠等:《船政奏议汇编》,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72—175,第1325—1326页。
- ⑥⑧刘坤一片,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68—9411—17。

(作者陈先松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焦海燕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邮编221116)

(责任编辑 赵增越)